

雅安：云都和雨城

■林之光

4月20日,雅安芦山发生7.0级强烈地震。全国军民万众一心抗震救灾。人们不禁会问,当地有什么样的特殊天气,对救灾会有什么影响。与东部地区相比,雅安地区确有特殊气候,例如冬暖夏凉,风小、日照少,而其中最特殊的,是本文要说的“云都”和“雨城”。

雅州天漏

雅安古称雅州,素有“雅州天漏”之说。即雅安这地方雨多,一下起来没完没了,像天漏了似的。因此又得名“雨城”。四川盆地著名的“清风雅雨建昌月”,其中的“雅雨”也是指雅安的多雨。雅安的年平均雨量1774毫米,虽比同纬度1300-1400毫米左右要多,但在南方大致也只是中等偏上。例如“邻居”峨眉山就1923毫米,我国福建、两广沿海,海南岛东部和云南西南部等成片地区年雨量都大于2000毫米,台湾基隆以南的火烧寮6489毫米,西藏东南部巴昔卡4495毫米更是我国最多雨的地方。

因此,一般用雨量多来解释“雨城”似乎有些牵强。我从“天漏”说法得到启发,为什么不称“天塌”、“天裂”,而用温和的“天漏”?是否“雨城”强调的不是指雨量多而是指下雨的时间多呢?我查得雅安年平均雨日218.0天,这就已经把上述大多数多雨地区比下去了。我发表在《地理学报》上的一篇文章专门研究了我国降雨(小时数分布,虽然资料年代不太长。雅安年平均雨时2379小时(平均每个雨日下雨10小时36分之多)。全国除了峨眉山之外,绝少有能超过它的。可见从下雨时间长来解释“雨城”可能更为合理。

雨日、雨时多对救灾工作是不利的,好在现在是在当地干季,虽然仍3天中两天有雨,但一般只是中、小雨。

“雨城”问题中还应该提到夜雨。因为雅安

地区雨量、雨时主要在夜间下。我曾统计过四川盆地中成都、重庆、南充、泸州和乐山的夜雨率。发现夜雨是四川盆地的普遍规律,其中尤以靠近雅安的乐山最典型。如以08-20时为日,20-08时为夜,乐山夜雨率高达80%。四川盆地是我国唯一大面积地形性典型夜雨区。

中国“云都”

“云都”是我新给起的名,意思是全国最多云的地方。过去我在撰写《天无三日晴考》时专门研究过川黔地区云量分布,发现四川盆地西部和贵州中北部是我国最多云的地方,年平均总云量都在8成以上(碧空为0成,满天云为10成)。我国最多云的地区正是四川盆地西缘的雅安、芦山、峨边和荣经等地,年平均总云量都高达8.8成。当地人抬头看天,平均只有12%的蓝天(雅安以南不远的马边年平均总云量8.9成,是我国云量最多的气象站)。

天上云一多,阳光就少。四川盆地西部正是我国日照最少的地区,年平均日照时数都在1000小时以下(同纬度上武汉、杭州都在2000小时左右),其中雅安地区宝兴只有791小时,是我国日照最少的气象站。因此四川盆地素有“蜀犬吠日”之说。意思是狗见了太阳,会惊奇得吠叫起来。但这主要是形容,因为即使宝兴,太阳最少的冬季中每天平均也有约100分钟太阳。

四川盆地全年最多云、最多雨时的季节是秋季。例如9、10月平均总云量分别高达9.2和9.3成。而秋季中云雨最多的时间又是夜间,这就使雅安秋月十分难见。多年前我曾统计过雅安连续46个中秋节赏月时(20时)的云量,平均

竟高达9.6成。只有1956年中秋,老天爷总算赏了雅安人一次脸。要知道即使“天无三日晴”的贵阳,这46年中也有8次中秋可赏月。雅安地区为什么是全国最多云量、最多雨时,最少阳光的地方?异常自然现象背后总有特殊原因。

特殊成因在青藏高原

雅安地区位于四川盆地西缘,背靠三四千米的川西(青藏)高原。每当偏东气流在高原西坡上被迫抬升,气流中水汽因降温而凝结,就会大雨滂沱。这就是现今对雅安地区多雨的解释。但这主要只能解释夏季七八月因副热带高压西进(控制四川盆地东、中部)造成的多雨(7月~8月雨量占年雨量的47.5%),而对冬半年(10月~3月)的全年最多云原因,就不能只用上述局地迎风地形来解释。

我认为,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青藏高原大地形。这是因为冬半年中我国南方高空盛行西风急流。低层西风被迫在青藏高原西侧分为两支,绕过青藏高原后,分别以东北和西南气流迎面汇合,汇合地点就在四川盆地及其附近。气流汇合会形成西南低涡等气旋性涡旋。这种涡旋中的上升气流会成云致雨,但一旦移出四川盆地就会很快减弱消失(因为是地形性的)。这就是四川盆地冬季比周围多阴雨的原因。但因为低涡并不强,厚度也不大,加上冬季气温低(水汽含量小),这就是四川盆地冬季云特多而雨却特少的原由。

这样,就解释了为什么雅安地区最多雨的夏季中反而天气晴好,日照百分率(实际日照时数与应照时数之比)分别为33%和39%,而最少雨的冬半年中反是全年最阴沉,最少日照(日照百分率16%-18%),这种奇异气候的原因所在。

随即到华山医院手术。住院前的晚上,我照例向“班主任”报告。电话里,程乃珊说,她也住在华山医院,天天发高烧,正在检查中。第二天,我刚到病房住下,立刻联系她,她说你自己病着,暂先就不要来看我了。可我一直牵挂她,动完手术后的第三天,我终于得到她被确诊为白血病的消息,这一次,我没为自己,却为她失声痛哭。

程乃珊比我稍后出院。2012年,当春天来临的时候,她欣然地跟我说,她已经开始恢复写作了。“班主任”都重新拿起了笔,我有什么理由不回到电脑前?于是,病后的我们几乎同时于三月份在《新民晚报》的“夜光杯”上重新发表文章。我们在电话里彼此祝贺。5月底,我去探望“班主任”。两个“瘦子”相见,不禁莞尔,我瘦了近40斤,而程乃珊瘦了20多斤,可我们都非常乐观开朗,说权当减肥了。她告诉我说,她已着手新的长篇小说的创作。她的声音依旧那么洪亮和畅快。离开后,我一个人走在寂静的巨鹿路上,想到程乃珊在用自己的生命坚守文学,我再一次为她默默地流下了眼泪。

程乃珊曾写过一篇小说,其中引用了《圣经》里的一句话:“我心有空处为你。”我想对她说,我在心里永远为你留着“班主任”这个无人可以替代的位置。

(选自《新民晚报》,2013年4月27日)



图片来源:眼视网

朱熹为什么非要这么做

■钱文忠

我第一次阅读今天意义上的“经典”是在1976年的某一天,那一天,百无聊赖的我,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,抽出一本残破不堪的线装书来——朱熹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。

此后,这本残书跟了我很长时间,一直跟我到北京大学,并随我漂洋过海来到德国汉堡大学,一待就是好多年。在我的印象中,这本书并不是一个什么好版本,随便一个地摊都能买到。虽说是一个支离破碎的石印本,但内容却完整无缺。30多年过去了,我依然在阅读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。

从历史上看,自从元朝把“四书”(“四书”是指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)定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之后,它们就成为读书人必须熟背的经典了,相当于现在的“国家指定教科书”。仅仅就这一点而论,“四书”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力,是无法评估的。

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原来只是《礼记》里的两篇文章,并没有特别尊崇的地位。其中,《中庸》在汉代已经脱离了《礼记》,并且拥有了单行本,但《大学》就不一样了,直到司马光时代才开始出现单行本。当然,司马光这样的大学者、大历史学家,

也没有告诉我们《大学》的作者究竟是谁。很多年之后,南宋的朱熹不仅继承司马光,把《大学》单行,而且继承二程(程颢、程颐),改变《大学》原文的章节文字,并且指出作者是曾子和曾子的门人!这样一来,《大学》不仅取得了儒家经典的最高地位,“四书”的系统也就确立了。那么,朱熹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呢?弄明白这个问题,不仅可以看出朱熹的苦衷,同时也可以看出“经典”之所以成为“经典”,是有着独特的生命历程的。

当时的朱熹,面临着一个令他非常担忧的局面:一千多年来,从印度传入的佛教以其特殊的魅力,慢慢渗透到当时的文化之中,并且引起了中国士大夫的浓厚兴趣,其影响力直逼在当时占据支配地位的儒学。朱熹自己本身就是儒、佛兼通的人物,他深深明白,仅仅依靠汉学所看重的“五经”,是绝对不能维持住儒学的地位的。而且“五经”所包含的本体论和方法论,比起佛教经典所包含的本体论、方法论,实在是差得太远了。

于是,朱熹凭借着自己深厚的学养和忧患意识,在《礼记》里找到了在本体论上有独到之处的《中庸》,在方法论上有独到之处的《大学》,并且

1922年,19岁的英国青年乔治·奥威尔来到彼时仍是英国殖民地的缅甸,担任警察。奥威尔出生于印度,他的祖父是加尔各答的教会执事,父亲在印度担任殖民官员,母亲的家族则是在下缅甸担任造船商与柚木交易商。所以他选择来到这个潮湿炎热的魔幻之地。

在缅甸不同城镇住了五年后,奥威尔回到英国,选择作为一个职业作家。十年后他写下:“比寂寞或炎热更重要的一项基本事实是,这里的景色相当奇异。起初,这个异国的景色令他厌烦,而后令他憎恨,但最后他会逐渐喜爱上它,他的意识以及他的信念或多或少受到这种景色不可思议的影响。”

五年的缅甸生活对奥威尔后来的写作理念起了深远的影响。影响不只来自那奇异瑰丽的热带风情,更在于他自身作为殖民体制的一环,尤其警察是压迫者的第一线,让他产生巨大的罪恶感,并反省到殖民主义的问题。他开始凝视底层人民、被压迫者,并且学着述说他们的故事。“码头上的犯人,死刑室等待行刑的男子,我欺凌过的下层民众以及老农,还有我在盛怒之下用木棍打过的仆役,他们的脸孔不断在我脑中萦绕着。”日后他写道。

回到英国一年后,奥威尔就发表文章《一个国家如何被剥削:大英帝国在缅甸》,并进而关注英国本身的底层生活。几年后,奥威尔发表以缅甸生活经验为背景的小说《缅甸岁月》。十多年后,震惊世界的《动物农庄》和《一九八四》出版。这两本小说是以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为背景,批判极权主义和集体主义。只是,1920年代就离开缅甸,并且死于1950年的奥威尔,可能没有想到这两本政治寓言小说,竟然成为20世纪后半叶缅甸政治的最佳描写。

有则笑话是说奥威尔不只为缅甸写了一部小说,而是三部:《缅甸岁月》、《动物农庄》与《一九八四》。

《动物农庄》的缅甸文版被改编成当地场景,并被赋予更诗意的书名:《四条腿的革命》。一个缅甸人说,这本书很有缅甸风味,“因为他讲的是猪和狗统治国家的故事,而这种事在缅甸已经持续好多年了”。另一个缅甸人说,他们没有必要读《一九八四》,因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《一九八四》。

几年前,美国记者埃米·拉金出版了一本书《在缅甸寻找乔治·奥威尔》,一方面寻找当年奥威尔的身影,探索他当年的缅甸生活如何影响后来他的写作;另一方面也不断对比《一九八四》、《动物农庄》和当今的缅甸政治。

“谁控制过去,谁就能控制未来;谁控制现在,谁就能控制过去。”这是《一九八四》里面的

失衡的南朝

刘牢之“仇贵”

■蒋家平

接受桓玄的策反,不战而降,希望既可以借桓玄之手除掉司马元显,又可有朝一日乘机夺权。结果,桓玄顺利东下,攻入建康,诛杀司马元显。

不过,桓玄获胜以后非但没有加封刘牢之,反而解除了他的兵权,让他去做会稽太守。刘牢之预感到自己大祸临头,决定去广陵(今扬州一带)投奔他的女婿高雅之,在江北收兵对抗桓玄。他一面让儿子刘敬宣去京口接家眷过江,一面召集手下将官商讨。参军刘琨说,临阵倒戈终究难成大事,刘将军您往年反王恭,近日反司马,现在又要反桓玄。一人而三反,何以立足?说完扬长而去,其余将官也大多作鸟兽散。

刘牢之感受到了众叛亲离、无力回天的悲凉,天下哪里还有自己的立足之处呢?这时候,和儿子约定返回的时间到了,刘敬宣却迟迟未归。刘牢之想,一定是刘琨截杀了他,向桓玄邀功请赏去了,于是万念俱灰的他上吊自杀。刘牢之刚死,刘敬宣就赶了回来,见到父亲的尸首,来不及大哭,就连夜渡江,投奔高雅之去了。手下兵士将刘牢之装殓好,葬于丹徒。桓玄知道后,下令砍棺,将刘牢之斩首,暴尸于市。

历来人们都将刘牢之之死归罪于他自身的反复无常,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就曾嘲讽他“诈而愚”。这当然不能算错,不过终究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。刘牢之是行伍出身,在士族门阀制度居统治地位的晋代,这一出身颇有尴尬之处:一方面他不具备尊贵显赫的社会地位,一方面他掌握军力又为门阀大族和朝中显贵所倚重。因此,他既被门阀政治所利用,又被士族权贵所轻蔑。比如王恭,为了让刘牢之为他效死力,屈尊与之为拜为兄弟,可同时又只把他当成行阵武将,一直对他“礼之甚薄”,使得刘牢之时刻感受到一种心理上的失衡,并由此滋生出对显贵们的仇视。尤其是当他所执掌的军事实力举足轻重的时候,自然在政治和社会地位方面产生更多的诉求,而当诉求的炽烈与现实的冰冷形成鲜明的反差时,他对门阀显贵的忠诚度便与日俱减。

从这个意义上讲,刘牢之的“一人而三反”,是东晋末年轻兴军事力量试图摆脱对门阀大族的政治依赖,从而寻求自身政治诉求和社会地位的一种无奈选择。他的最终失败,不是败于军事,而是败于门阀政治,败于他在与门阀士族进行搏斗时的彷徨无措、进退失据。

不过,刘牢之虽然败了,以新兴军事力量为代表的社会底层势力终归已经形成,并不断壮大。18年后,北府兵旧将刘裕终于代晋建宋,修成正果,而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门阀政治历史,也从此江河日下。

(本版未收到稿费的作者请与编辑联系)

可以确定,一直如此

■胡子博

可以确定
他不是小红
也不是小李
不是小黄
不是小羽
不是我
更不是你
但他一直使用我们的方言说话
但我们都听不懂他的话
他经常一声不吭,不说话
我们不解
他为什么不说话
我们不知道
怎么去和他说话
我们不懂
应该怎么谈论他
他站在那里
就像不在那里
他离开那里
好像还在那里
他让时间过了二十年
时间也让他过了二十年
他和他,他们并排坐在一起
他和我,我们并肩望着他
而你和你
你们仿佛对一切
视而不见,一无所知
一直如此